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康有为



一、好学深思，立志救国

1858年，古老的中华帝国又一次蒙受了列强的羞辱，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攻入天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等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致使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更深的苦海。就在这年3月，一位在近代中国救辱图强的斗争中斩将擒旗的伟人诞生了。他就是几十年后在神州掀起洪波巨澜的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戊戌政变后改号更生，晚年自号天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因祖籍南海被尊称为南海先生，或康南海。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苏村敦仁里康氏老屋。南海康氏是南海县的大族，世代习文修礼，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他的高祖以举人入仕，官至广西布政使。曾祖早年讲学于乡，有“醇儒”美称，后官至福建按察使。祖父康赞修长期担任地方教育管理官员，在广东知识界颇有名气。父亲康达初博通古今，学术精湛，因病长期在家修养，他勤苦治学的精神，在康有为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康有为是家中的长子，家族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光大门楣，有所作为。受家中浓厚读书气氛的耳濡目染，及长辈们的谆谆教诲，他从小就深深领悟到：只有饱读诗书，立身扬名，才是人生正途。6岁时，家中请广州儒生吕凤简先生担任教师，让他正式入塾读书。在吕先生指导下，他熟读了四书等儒家经典。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读书又十分刻苦，因此吕先生对他格外喜欢。一次叔伯们想试试他的才气，出“柳成絮”三字让他应对，他脱口而出“鱼化龙”。不但对仗工稳，而且器度非凡，表现出宏伟志向，引起长们一阵感叹，连称：“此子终非池中物也！”

1868年2月，康达初因病去世。临终前谆谆告诫他，要“立志苦学，孝敬尊长，友爱姊弟。”未满10岁的康有为牢记父亲遗训，一心要成为显亲扬名的有用之才。他跟随祖父住在连州官舍，日夜苦读。祖父康赞修是个德高望重的儒生，对他的成长施加了重要影响。祖父热心指导他读书。教导他熟读儒家经典，领会其中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阅读史书，通鉴古今变化大势；揣摩诗文义法，掌握著述之道。祖父不但经常给他讲学，还常常教导他胸怀大志，立身扬名，报效国家。在官舍里，他看到过清政府发到各地的邸报，对国家大事有了一些了解。对当时政界名人的事迹，他十分羡慕，决心做匡世济民的英雄。康赞修喜欢游览，常带着康有为登临家乡附近名胜。祖孙二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爱国豪情。这样的壮游开阔了他的胸襟，扩大了他的视野。在祖父影响下，他志向远大，开口必称“圣人”，因此，同学们把圣人二字与他的名字联起来，称他为“圣人为”。

1873年，康有为参加乡里的社学考试，一天写出6篇文章。在百余篇密封的考卷中，考官选中15篇，他的6篇全部入选，其中名居前3篇竟全是他的试卷。在作诗考试中，他的诗也获得第一名。由此康有为赢得很高声誉。

1877年，康赞修老先生在救灾中殉难，20岁的康有为回到家乡继续读书。据说他每天早晨取出一批书，放在桌上，用一把锋利的锥子，猛力一扎，扎穿几册，当天就必须看完几册，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

他治学有种求真求实的执拗精神，总要从琢磨出自己的体会来。为了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他到家乡附近江山镇的礼山草堂拜名儒朱次琦为师，继续求学。朱次琦教学强调将品德修养与经学、文学、史学等传统学科的学

习结合起来，是一位行为刚正，学术精湛的理学大师。他的言传身教，改变了康有为的人生道路。在礼山草堂，康有为下苦功夫系统研究儒家典籍和孔子的思想体系，研究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并广泛涉猎《楚辞》、《文选》、《杜诗》等文学作品，学业日进。他读书善于思索而不盲从，有一次甚至因对唐代大学者韩愈的评价不同，而与朱次琦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3年刻苦学习他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功底，使过去所学融汇贯通，具备了治学的大家气度。可是面对残破的河山、涂炭的生灵，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解生民于倒悬？这个问题，他在传统学术中没有找到答案。

怀着困惑与苦闷，1878年他辞别老师，茫然走出书斋，回到家乡。次年初，他来到离家不远的西樵山白云洞结庐读书，希图在与自然的接近中，体悟到真理。

在一个偶然机会，他结识了来此游玩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经几番接触，二人结为忘年交。张鼎华是以文学誉满京华的名士，常与康有为促膝长谈，纵论天下大事。从张鼎华那里，他了解到时事政治、朝章典故、京城风气、当代人物事迹等，对现实有了初步理解，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朦胧地看到了走上社会寻找出路的希望。他开始钻研《周礼》、《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等经国有用之书，希望从中找出救国救民的方案。

这时他读到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方社会制度、风俗民情和文明程度的书籍。新奇的外部世界深深吸引了他。为了求得更深入的了解，他于1879年客游香港。在那里，他一方面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屈辱，一方面也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整洁宽敞的街道，穿行往来的车辆，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使他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基础开始动摇，觉得以往对外国人的民族偏见应当打破。他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局面，痛感如不奋起直追，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的中国，将被远远地甩在世界潮流之后。在香港，通过一位曾任中国驻日公使馆翻译的同乡，他又看到了不少翻译的西方书籍，更多地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

1882年，他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作文喜欢自抒胸臆，不愿循八股文常格而落选。归途中，满目疮痍的残破河山和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贫苦百姓，刺激着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赤子情怀，进一步激发了他挺身而出赴时艰的责任感。在上海，他订了一份美国人主编的《万国公报》，购进了大批的西学新书。据载：上海江南制造总局30年间售出的约1.2万册西学书籍，他购买自读或送人的就有3千余册，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通过认真研读西方书籍报刊，他进一步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政治制度，还学习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其中，天文、物理、古地质学等使他心智大开。他认真研究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并在1886年写出了一部天文学专著《诸天讲》。在著作中，他对太阳系的起源，太阳黑子，月亮的阴晴圆缺，行星、彗星、流星等做了初步的科学阐释。科学知识战胜了儒家传统的天道观，改变了他原来的宇宙观。进化论思想在他头脑中逐步形成，并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面对残破而又顽固的封建营垒，他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把新道理付诸社会实践。他具有反传统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勇于向旧势力挑战。1883年，他的长女5岁时，到了按当时习俗缠足的年龄。他认为这是违背人

类生理的一种陋俗，是对妇女的残酷迫害，于是坚决不让女儿缠足，声言要把两万万女子从此种苦难中解救出来。这件事在乡间引起很大轰动，全乡的人都起来反对，一些长辈甚至强令他的长女裹足。康有为坚决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作法。从这件事上，他看到习惯势力的可怕和冲破传统的意义。为了将斗争进行到底，并扩大战果，他与一位也不让自己家女人缠足的卸任外交官商议，成立了“不裹足会”。章程规定：凡入会者均须保证，不让自己家的妇女裹足；已经裹足的不强迫放足，但如自愿放足，则会员都去庆贺。经过他的宣传，参加“不裹足会”的人渐渐增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对妇女缠足的民间组织，反映了妇女反对缠足的强烈愿望。此举实际是向封建伦理纲常宣战，动摇了旧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全国不缠足运动的先声，从 1895 年以后，在广州、上海、天津、北京、长沙、福州等大城市以及广东、湖南、江苏、福建等省乡村，先后出现过这类组织，掀起了反对缠足的社会运动。这是康有为与旧势力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他取得了胜利。

二、著书立说，授徒讲学

经过几年学习研究，他初步形成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实行变法维新，振兴中华的政治思想。此间他曾向洋务派领袖之一张之洞建议多印西方政治理论著作，以开启民智。中法战争中，中国虽胜犹败的惨痛现实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为了促使人们从沉睡中觉醒，他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引入社会政治领域，撰写了《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礼运注》等政治理论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最早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向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开战。

《实理公法全书》共 16 篇，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编写形式，在实理公法的命题下，阐发人道主义学说。书中用实理公法否定封建主义的天理与私法，提出反对封建等级内容的独立的人的价值观，宏扬人的天赋权力学说，反对三纲五常的旧礼教，提出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描述了新社会理想。在《礼运注》中，他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批注，初步阐述了他对人类未来的美好设想。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历据乱世、升平世、而达到太平世，进入天下大同这种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在大同世界，人人平等，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与公民权利，私有财产已不存在，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极大满足。对这个理想的实现，他坚信不疑。他一生的奋斗，都指向这个高远的终极目标。改变中国的现状，在他看来，只是实现远大理想的第一个步骤而已。

1888 年，他再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仍因文章不同常格，没有考中。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为登上政坛，大展宏图创造必要条件。科场的失意，他并不十分在意，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对西南边陲的渗透却引起他的警觉。

这年 12 月，康有为实在觉得再不能坐视局势的恶化，他怀着一腔忧愤，给光绪皇帝上书，请求改良政治，自强自救。他以强烈的危机感，描述了中国面临的危难局势，对朝政提出批评，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具体建议。所谓“变成法”，就是革除弊政，参照古今中外的法制，推行新法来治理国家。“通下情”就是让朝廷开通言路，广泛听取臣僚及士人意见，使政情上通下达。“慎左右”就是要统治者明辨忠奸，慎重用人，重用贤才，斥远奸佞。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跳出传统政治的格局，但对当时的政治状况，却有很强的针对性。

他的上书得到朝中开明官吏黄绍箕、沈曾植、屠仁守等人的同情和支持，国子监祭酒盛昱答应为他代呈。可这份上书终因横遭腐朽势力阻拦，没能进呈到光绪皇帝面前。但这行为本身和书中阐述的政治主张，却打动了无数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仁人志士。人们纷纷传抄《上皇帝书》，康有为一时成了风云人物。

上书受挫没有动摇他的斗争决心。此时的诗句“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抒写了他的心境。当时慈禧太后正热心在颐和园大兴土木，朝中大臣与宦官勾结，把持大权，国事日非。康有为在京一年有余，看透了政局的黑暗，朝廷的腐败，也感到了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国人思想的麻木保守；认识到要变法自新，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须攻克封建思想文化堡垒，做社会改良的宣传鼓动工作。1889 年秋，他反回故里，着手寻求能为中国知识界接受的思想学说，决心先从思想领域打开缺口，做思想发动

工作。

这时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取得成功，康有为似乎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890年他去拜访著名今文经学家廖平，讨论今文经学问题。从廖平的著作中，康有为受到很大启发，找到了改造经学，使之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的道路。

他先后写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学术巨著，向传统思想学术开战。《新学伪经考》论证长期流传并被统治者作为治国修身指导的儒家经典，大部分不是孔子等人修订先秦文献或典章制度的记录，而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为配合王莽改制篡汉而伪造的。这就等于说两千年来从统治者到普通学者学习并应用的大部分是伪书，人们都受了刘歆的欺骗。这部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人们都为他新颖又大胆的论述所震慑，长期统治思想界的经学发生动摇，人们思想为之一新。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是为了破除思想迷信，写《孔子改制考》则是为他的政治改革开通道路。在这部书中，他论述孔子的学说主要是关于改革国家制度的理论，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就是托古改制。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民权、民主、自由、平等学说都是孔子的发明。他主张的维新变法正是继承着孔子遗志，是遥隔2400年后与孔子所为一脉相承的圣业。这样一来，他的思想学说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许多人解除了思想顾虑，接受了他的维新观点。这两部著作虽然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中却是震烁古今的不朽文献。在近代思想界，它如划破漫漫长夜的一声惊雷，震聋发聩，使人猛醒。

康有为来广州，使一个青年学子怦然心动。他就是成为康有为开门弟子的陈千秋。陈千秋当时正在广州最有名的书院学海堂求学。他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具有高昂的爱国热情，对康有为上书批评时政的行为非常敬佩。听说康已到广州，便前去拜访。一见面，他马上被康有为深湛的学识和精辟的思想见解所吸引，茅塞顿开。经反复考虑，放弃了学海堂的学业，前来拜康有为为师。陈千秋入师门后，更感到康有为的学问壁立千仞，难窥堂奥。便向学海堂学友梁启超谈了自己的感受。梁启超16岁即中举人，是名噪一时的才子。听了陈的介绍，引起极大兴趣，便去拜谒。交谈中，他也一下子被康有为的气魄征服。想不到自命不凡的自己，相形之下显得那么浅薄、无知，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认定从康有为这里，才能学到真正的学问。于是放下自己的举人架子，拜当时只是秀才的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陈千秋后来英年早逝，康有为万分痛惜，体会了孔老夫子痛失爱徒颜渊的心情。梁启超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是与康相映的一颗巨星。

陈、梁之后，有志好学的青年学子不断前来求学，在他们的请求下，康有为正式办起了学堂——长兴学舍。长兴学舍兴办后，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1893年学生有40余人，1894年达100余人，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连同在其他地方慕名来投的学生已达1000余人。随着学生不断增加，学堂不得不再迁址。1893年迁到广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挂起了“万木草堂”匾额。

康有为办学注意对学生精神气质的培养，着重传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注意培养学生从经世致用角度理解学问，增强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万木草堂不教授八股文等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之学，它的课程主要有四大类：义理之学，即儒家哲学、诸子哲学、佛学、西方哲学等；考据之学，即经学、史

学、掌故之学、地理、数学、物理学等；经世之学，即政治学、中国及世界各国制度沿革等；文字之学，即中外语言文字学。

康有为讲学特别认真、投入。他声音宏亮，精神饱满，往往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仍神完气足，精力充沛。他学识渊博，每论一学、一事，必详究本末，考辨得失，广引例证，结合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以启发同学们深入观察事物，分析思考问题，培养治学能力，形成远大的政治理想。康有为立身刚直，人品高尚，万木草堂的学生们对他非常尊敬。除给学生们讲课外，康有为还每天到讲堂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的学生多是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的人，所以不断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疑难越多，康有为越精神抖擞，思路开阔，学生们往往获得很大启发。

在康有为精心诱导下，在这所学堂里培养出了一批政治运动的骨干和思想领域的启蒙学者，如徐勤、麦孟华、梁朝杰、韩文举、欧榘甲、陈和泽、曹泰、王觉任等都是大有作为的杰出人物。

三、公车上书，力挽狂澜

1893年康有为应乡试，中举人第八名，取得了考进士的资格。

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年底，大连、旅顺相继被日军占领。次年初，清政府多年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4月，清廷被迫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与日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

- 一、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人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 二、中国赔偿给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 三、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个通商口岸。
- 四、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

这个苛刻的条约传到北京，全中国人民都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面临国家民族的灾难，人们的民族觉醒意识空前高涨，爱国热情极为高昂。北京的大街小巷掀起了拒约浪潮。当时正值全国科举大考即将举行，全国举人（公车）都集中在北京。这些尚未步入仕途的士子更是群情激愤。大弟子梁启超在康有为影响下慷慨激昂，奔走联络。首先联合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等数十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力言台湾不可割给日本。梁启超等人上书之后，福建、四川、江西、贵州以及江苏、湖北、直隶、云南等省举人也分别上书，强烈反对割台。几天之内督察院衙门前车马骈集，填街溢巷，有时长达数里。台湾举人们涕泪交流，慷慨陈词，引得一些官员也连连表示敬意。

人们高涨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了康有为，他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以改变政局。他召集18省举人1300余人聚会，决定上一公呈，请求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自救立国。这时他早已因倡言变法图强而名满天下，于是，大家公推他起草上奏书。他用一天两夜时间，写出了洋洋1.8万余言的《上今上皇帝书》，准备由各省参加会试的举人签名后上呈。

康有为在上书中首先驳斥了出卖主权，对日妥协就可以保清廷数年安全的幻想，指出：日本割台后，其他列强必接踵而至，提出领土要求。答应则国土日削，不答应则战争势不可免。中国将进退失据，国无宁日。在反对议和的同时，他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就是建议光绪皇帝下三道诏书：第一，下罪己诏，以感动忠臣义士，使他们奋起为国雪耻；第二，下明罚诏，严惩主和辱国的大臣和征战不利的将帅，以重振朝纲；第三，下求才诏，破格选拔人才。“迁都定天下之本”，就是根据当时京师屏障全失的局势。迅速迁都西安，避免日本的武力挟制，在内地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练兵强天下之势”，就是摆脱中国将衰、兵弱、器劣的状况，用练新兵、选良将、购精器的办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变法成天下之治”，在康有为看来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国状态的根本措施。

他提出要行“富国之法，养民之法与教民之法”。富国之法包括：由国家发行钞票，以扩大商务，筹措军费，聚资建设；兴修铁路，发展交通；允许私人开厂造机器、舟船，发展工业；开发矿产资源，以获其利；自铸银圆，以收利权；开设邮政业务，便利公私信件传递。养民之法包括四项内容：务农，即全面改造农业；劝工，即鼓励科学创造发明；惠商，即减免重税，保

护商业；恤穷，即扶贫济弱，收取民心。教民之法也有四项：一、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二、改革科举，增加时事政治与科学知识内容；三、开设报馆，移风易俗，加强舆论作用；四、设立道学，用孔子之道统一人们思想。

康有为对清政府政治制度的低效落后进行了有力批评，认为君臣、君民、上下级之间的阻隔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应当吸收民众，特别是士人参加国家管理。

最后，康有为告诫光绪皇帝：如果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上述主张，中国就会由弱转强，收复失地，一雪国耻。如再徘徊观望，苟且因循，则局势将不可收拾。

这些建议与措施，既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色彩，又体现出他迫切要求改变中国落后状况，抵御列强侵略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其中许多主张是他多年考察、研究的结果，是切实可行的救弊良方。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提出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企图在保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反抗侵略，救亡图存，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

康有为的上书脱稿后，于5月1日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召集十八省举人及京官名流讨论。听了康有为的讲演和上书后，群情激昂，深受感动，纷纷签名。准备4日去都察院集体投递，阻止签约，洗雪国耻。公车上书引起了慈禧太后及朝中顽固派官僚的恐慌。“马关条约”原定于8日在烟台正式换约，他们怕举人们的爱国行为引发更大的事态，便胁迫光绪皇帝于2日批准条约，在条约上用印，造成了既成事实。孙毓汶等慈禧党羽又造谣惑众，虚声恫吓，千方百计阻止这一爱国行动。2日，举人们再次讨论散会后，不少举人听说和议已成，大局不可改变，斗志便有些松懈，收回了签名，也不愿再去参加斗争。康有为不得已取消了上书行动。

条约批准后，各省举人对力主签约，极力破坏公车上书的军机大臣孙毓汶恨之入骨，扬言要抬着棺材到孙家示威，杀死这个卖国贼。康有为认为这是过分之举，予以制止。这个消息吓得孙毓汶不知所措，后来被迫辞职。

这场斗争不失为中国近代爱国运动史上的一个壮举。成千士子在数载苦读，眼见踏上光宗耀祖的坦途之际，置功名利禄甚至身家性命于不顾，拍案而起，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显示出中国人刚直不阿的高尚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这次公车上书，把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变成了实际的爱国政治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康有为也走上斗争舞台，从一个启蒙思想家，变成了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这封上书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上，可封建阴霾毕竟遮挡不住它的思想光辉。上书第二天，《上皇帝书》副本即开始传抄。一个月后，上海出版发行了它的印本。这一文献在祖国大地上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行为本身也使士庶民众受到极大鼓舞，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上书期间，会试发榜，康有为中第五名，殿试降为二甲第46名，赐进士出身。即使对康参加科举考试之事，顽固派也要进行阻挠。此次会试的总裁徐桐、副总裁李文田等人曾预先指示阅卷大臣：广东省试卷中有才气者一定是康有为，注意不要录取。阅卷者在试卷中看到一份才华横溢的卷子，传阅后大家以为是康有为的，遂弃置不取，不料这是梁启超的试卷。当前5名以外的榜已填完时，徐桐高兴地说：康有为一定没被取上！可填前5名时，康

有为试卷正在其中，而且拟取为会元。徐桐等已无可奈何，只能把康的名次从第一降至第五。徐桐又羞又恼，吩咐家人：康如下拜谒，拒而不见。他根本不懂得，康有为是不屑于向他这样的守旧官僚折节礼拜的。

考中后，康被授予工部预衡司主事之职。他考进士只为扩大政治影响，没把这个六品官放在眼里，所以他继续从事维新事业，根本没有到任就职。他自己解释说：“我自知无作官才能，不能为朝廷奔走效劳。再说我生平以讲学著述为业，本打算以平民身份终此一生。因为难违母命，才不得已应试，连科举都无意参加，怎么会去作官呢？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没有到任。”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他们感到在华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俄、德、法三国同日交涉，要求日放弃辽东半岛。日本当局被迫同意归还已占领的南满和辽东半岛。

腐败的清政府又盲目乐观起来，恢复了文恬武嬉的常态。康有为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5月末和6月末，又接连两次上书给光绪皇帝，阐述政治主张，呼吁改变现状，提出变法的具体步骤与措施。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因形势变化，去掉了拒和、迁都的主张，集中讨论了变法问题。这时，康有为已是朝廷命官，都察院不能对他的上书予以扣压，于6月3日代递军机处。倾向维新的光绪皇帝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马上将上书呈给光绪皇帝阅览。光绪皇帝读到上书后，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对康的主张大加赞许，认定通过变法维新，不仅能使中国富强，而且可以改变自己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他当即命再抄录三份副本，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存军机处，另一份放在宫中备自己随时观览。

第三次上书的成功使康有为受到很大鼓舞，他又写出第四封上书，详细论述变法的轻重缓急，并提出中国首先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鼓励科学发明，使中国迅速走向富强；二是仿照西方，设立议院以通下情。

当时，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对于光绪帝亲政后无权的处境十分不安。他认为康有为代表了可以帮助皇帝巩固地位，改变政局的新生力量，急于与之建立起稳固的联系，作为外援。他特意走访康有为，不巧没有遇上。康有为也正想通过当政者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得知此事后立即登门回拜。翁向康透露了皇上无权的实情和渴望掌权重振朝纲的愿望，同时也受到康的鼓动，对维新变法有了初步的理解。事后，康又多次写信给翁，督促尽快实行新政。在康的影响下，翁同龢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事业的中介人。

这年7月，在康有为思想推动下，光绪帝与翁同龢决定部分实行新政。下诏在各省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如修铁路，开矿山，造机器，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铸银币，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厘金，核关税，稽荒田，汰冗员等。接着，他们又拟定十二道诏书，发布维新之令。可是这些措施遭到各地督抚们的抵制，在慈禧太后等保守的后党支持下，这些地主官僚们更是有恃无恐。由于慈禧太后的干预，这一年光绪帝推行新政的计划被迫中止。

四、办报结社，开通风气

几经反复，康有为认识到斗争的艰难曲折。他懂得了：原来以为只要皇帝下诏，变法事业即可大功告成的想法是幼稚的，期望朝廷自上而下实行变法，时机还不够成熟。当务之急是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形成群体力量。要倡新学，通风气，开发民智，动员国民共同起来，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局面而努力。

为了宣传新学，开通风气，他决定创办一份中国人自己的报纸。在梁启超、麦孟华两位弟子帮助下，他捐资在北京办起了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这份报纸主要由梁、麦二人撰文，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及新闻消息等，每期还刊一篇论说，宣传富国强兵之道、教士养民之法。这份报纸起初为双日刊，主要向政府官员、朝士大夫发行。它创办后，在京城产生了很大影响，上层社会渐渐对世界大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变法维新主张得到很多人的理解。报纸发行45期后，因与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名，改为《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当时维新派已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强学会，《中外纪闻》就成了强学会的机关报。《中外纪闻》加大了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扩大了发行范围，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康有为认为通过建立学会，可以把拥护变法的人团结在一起，形成政治势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建立学会应当先从北京开始，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可以产生登高呼远的效果。可是建立学会是违反清政府律令的，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康、梁等人不辞千辛万苦，四处奔走，反复动员，终于博得了朝中大臣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张之洞等人的同情与支持。1895年9月，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和帝党官僚结合组成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基本会员有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陈炽、张孝廉、杨锐、文廷式、王鹏运、沈曾植等人。康有为受大家推举起草了《强学会序》，作为组织纲领。这是一篇维新变法的政治宣言，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康有为在京的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不安。他们竭力造谣生事，挑拨维新派与帝党官僚集团的关系，甚至策划对康实施迫害。为避祸，康有为不得已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开辟新的维新阵地。

11月，他先到南京，争取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对在成立上海强学会的支持。当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陪同康来到上海。12月，上海强学会开局，成员主要有康有为、梁鼎芬、黄绍箕、张謇、黄遵宪、章炳麟等。康有为拟定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专求中国自强之学。确立强学会的工作主要是译印图书、刊行报纸、成立图书馆、创办博物馆等，以传播西学、新学，变法图强为宗旨。章程还强调强学会总会设于上海，建立与北京强学会的联系，并在各省相继设会。康有为重视舆论作用，将办报作为学会重要工作之一。他把学生徐勤、何树龄由广东调来，于1896年初创办了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强学报》在创刊号上以孔子卒年纪年，置于光绪年号之前，隐含与清政权对抗之意，反映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主张。

维新派的一系列活动和维新思潮的迅速传播，让封建顽固派看到了新思想的巨大威力。他们意识到：如再让维新派继续进行新政的宣传鼓动，就有危及他们统治的危险，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先是，李鸿章授

御史杨崇伊奏参强学会从事非法活动，包藏祸心。继而，慈禧太后逼迫光绪下令查封北京强学会。接着，张之洞以康有为行为过于激进，作出解散上海强学会，停刊《强学报》的决定。

维新事业虽暂时遭到沉重打击，但北京、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和上述报纸的创办，对宣传民众，开通风气，传播维新思潮所起的客观作用已无法逆转。此后，人心思变，办报组会之风遍于天下，维新思潮演成全国范围普遍性的社会运动。

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修订他的《孔子改制考》，撰写新的著作。他时刻在注视着政坛的风云变化，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梁启超在北京受到打击后，感到北京受专制政府的直接控制，保守势力太强，不如从上海打破缺口，通过办报推动变法运动。在康有为的支持下，梁启超来到上海，于1896年8月正式创办了《时务报》。他自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因为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了些让步，得到了张之洞一派开明官僚的支持。《时务报》很快发行全国，发行量达1.7万余份，居全国各类报纸之首，受读者欢迎程度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它起到了当时其他宣传工具无法取代的作用。它打破了清廷封禁维新思想报刊的无形禁令，使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在它的影响下，一些重要城市相继出现了各种类似报刊，新思想的潮流已不可阻挡，古老的赤县神州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康有为看到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很快传播，中国却不知独尊孔教，致使思想混乱，文化衰微。为了宣传孔教，推进维新运动，他于1897年3月在广西发起圣学会。又创办《广仁报》，介绍中国国情及各国政治，呼吁士人奋起救国图强。这些行动，使长期闭塞的边地风气大开，卷进了变法图强的时代潮流。

正当康有为救亡图强努力奋斗之时，列强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2月，德国帝国主义借故侵入我国胶州湾，次年3月，以武力胁迫手段，强行将胶州湾租借99年。俄帝国主义接踵而至，强行租借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法、英、日等其他列强也相继来切割中国领土。至此，中国已被划分为若干块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亡国危机迫在眼前。

当德侵略我胶州湾的民族危难关键时刻，康有为再次拍案而起，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在上书中，他尖锐批评了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苟且偷安只会一步步走向灭亡。强调国势日衰，又不思振作是导致当时危机的主要原因。他沉痛指出，其时除变法外已没有其他救国之策了。在书中他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光绪皇帝采择：上策是效法俄、日两国，以定国是，彻底变法；中策是广泛听取群臣意见，讨论如何进行变法；下策是允许各省官员自行变法，3年后将这些新政结合起来，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他认为行上策可使国家强盛，行中策可维持积弱局面，行下策则不至于亡国。在上书中他还正式提出国事需经国会议行和颁布宪法的主张。可惜这次上书又被有关衙口扣压而未能送到皇帝手中。

这年冬天，他顶风冒雪，奔走于公卿大臣之间，争取更多的实力人物的支持。他的顽强精神使翁同龢、孙家鼐等稍有爱国之心的朝中大员深受感动，暗地里对他进行帮助。当他处于斗争最困难时刻，准备离京南下，另谋出路之时，翁同龢亲临南海会馆，挽留康有为，告知他已向皇上推荐了康有为，康即将受到重用。

第二天，给事中高燮在翁授意下向光绪皇帝上奏，举荐康有为学识渊博，

对国家大事有精到见解，请求皇帝召见，并委以重任。翁乘机为康说好话，光绪皇帝曾读过康有为的上书，留下十分深刻印象，近几年又一直有意于实行变法，便同意召见康有为，当面咨询。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不便直接反对，搬出“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见”的陈规，加以阻拦。光绪帝遂命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奉旨来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官员与康有为展开热烈的讨论。康有为有力论述了变法的必要性，详细阐述了他在各领域进行变法的具体设想。次日，翁同龢向光绪帝汇奏咨询结果。光绪命康有为条陈所见，并命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亲览。

康有为奉诏后，十分兴奋，连夜起草奏章。29日，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奏折中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以波兰、缅甸等国历史说明不变则亡，请求光绪帝审时度势，排除干扰，下定决心，迅速变法。他建议就近取法于日本的成功经验，召集变法人材，设立变法机构，实行以下变法措施：一、大集群臣，下诏明定国是，宣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二、让群臣上奏表态，支持变法，反对者或不表态者予以免职。三、设“上书所”，接纳天下士民上书，一般官员上书也可直接送达，不必由各部主管人员转递。四、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天下通才十余人入局，其地位与王公卿士平等。皇帝在制度局与这些通才重新商定一切政事制度，然后颁布实行。以制度局为变法改革的首脑机构，再设12个局行使国家行政职能。这12局分别是：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康有为还建议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在每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分局，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创办新政，包括绘制地图、调查户口、修筑铁路、发展农工商各业、开设学校、兴办卫生事业、设置警察局等。康有为坚信：地方新政如果得到士绅支持，会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效。这次上书较完整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对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有为将这封上书交工部代呈，工部尚书许应骙迟至3月5日才送达皇帝手中。光绪帝读后，被深深打动，坚定了实行变法的决心。他将这一奏折下发总理衙门，交大臣们讨论，同时吩咐以后收到康的奏章，不许延误，即日进呈。

康有为听到这一消息，受到极大鼓舞，3月12日，又呈递了《上清帝第七书》和他撰写的《俄彼得变政记》。康有为在《俄彼得变政记》中详记俄从弱转强的历史过程，认为俄国改革的成功给中国树立了榜样。中国与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君权最尊，曾被别国削弱等。只要中国像俄国那样帝王奋发有为，实行变法，就一定能很快转弱为强，崛起于东方。不久，康有为将他的另一部著作《日本变政记》呈给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日本变政记》按时间顺序记述日本明治维新的兴起与发展，重点介绍日本政府的变法措施及由来与实行情况。书中康有为还用按语形式提出了自己对维新运动的看法及变法的具体设想。这部书对光绪皇帝和百日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指导新政的一部重要著作。光绪皇帝在康有为鼓动下跃跃欲试，一场伟大的改革运动即将在神州大地卷起万丈狂澜。

五、百日维新，壮志难酬

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严重，朝中臣僚惴惴不安，爱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们救国要求更加强烈。面对危难的政局，光绪皇帝的改革决心越来越坚定，变法主张已成弦上之箭。

在这样的形势下，梁启超、麦孟华和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等人相继来到北京，康有为如虎添翼。当时正值会试，全国举人再次云集京都，康有为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掀起一场推动改革的风潮。康有为已是政府官员，不便直接出面活动。他让梁、麦等人进行宣传鼓动，联络各省举人一同上书。在麦孟华、梁启超、龙应中等康门弟子呼吁下，两广、云贵等省百余举人于3月27日来到督察院请求代递上书，反对政府向俄妥协，割让旅顺、大连。

4月初，山东来京的举人告发德国人在年初曾闯入即墨县文庙，打毁孔子神像，挖去子路像的双目。这一消息引得京师大哗，朝野震怒。康有为更是义愤填膺，痛感如再不行动起来，国亡、种灭、教毁的惨剧就会成为现实了！在他的策划下，由麦孟华、林旭、梁启超等12人联合署名写出《请联名上书查办圣像被毁公启》，联络各省举人1000余人先后上书都察院，请求向德国抗议，查处破坏圣像之人，赔偿一切损失。

为了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形成更集中的力量，共同拯救危难，他联合起各分散的学会，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保国会”。康有为起草《保国会章程》，宣布以救国、救民为目的，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内政外交等方面变法事宜为活动内容。成立会上，康有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动员大家共赴国难。保国会成立后，连续几次开会，宣传变法救国，扩大政治影响。康有为成为爱国运动的中心人物，每日四处奔走，联络会员，赴各处讲演。一时，爱国救亡呼声响彻京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高涨的爱国热潮，又一次引起守旧派的恐慌，与维新派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吏部主事洪嘉与撰写了一篇《驳保国会章程》的文章，逐条批驳保国会的30条章程，并对康有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指使浙江举人孙灏抛出。5月2日，御史潘庆澜上奏，诬蔑康有为成立保国会为聚众不道。守旧官僚随声附和，纷纷上折，恶毒诽谤康有为与保国会。在顽固派掀起的浊流面前，有的人畏葸退缩了，有的人在徘徊观望，也有少数见风使舵的人向维新派杀起了回马枪。由于队伍分化，保国会在无形中解散。

但康有为没有被这股恶势力吓倒，他进行了有利的反击：将《保国会章程》全文在外地报纸刊出，让国人了解其宗旨；组织一系列文章，宣传保国会的活动，反驳守旧派的攻击诽谤。

保国会的行为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他向大臣公开表态：保国是好事，岂可查究？为了防止慈禧太后追问，他将所有参劾保国会的奏折都封存了起来。当御史文悌在守旧大臣指使下弹劾康有为等“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时，光绪帝大怒。指责他受人支使，结党攻讦，沽名钓誉，下令革去其御史官职。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斗争形势暧昧不明之时，变法改革反对派的领袖、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突然病逝，反对派失去了主帅。慈禧太后见人心思变，难以违拗，恐怕不作出点姿态来失掉了民心，也就对光绪皇帝变法的请求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6月6日，康有为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再次请光绪帝下决心变

法，以扼制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这道奏折促使光绪帝下了变法的最后决心。经几番交涉，慈禧太后同意放权，让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维新。经过长期斗争，康有为的政治理想终于得到了实施的机会。他满心喜悦，对未来充满信心！

6月11日，光绪帝召见群臣，举行仪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实行变法维新。诏书一下，举国欢腾，人们热切盼望着改革具体举措的实施，盼望着古老中华的新生。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因此人们称这一变法为“戊戌变法”。

康有为希望成为光绪帝的顾问和助手，亲手实施自己的改革方案。在诏书颁布当日，他与侍读学士徐致靖商议，共同拟定了一个请求光绪帝破格选用有才的奏折，以徐的名义于13日呈上。奏折中论证了人才在变法中的重要作用，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5人参赞新政。这个奏折正中光绪皇帝下怀，他早想把康有为等坚定的维新人士网罗到自己身边，壮大自己的力量。马上下诏，宣布16日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安排其他时间召见谭嗣同等人。

就在光绪帝等变法派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反对派的阴谋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变法当天，慈禧太后一面对变法表示赞成，一面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任命自己的心腹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让刚毅改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崇礼任刑部尚书，从而将几个要害部门都控制在自己手中。15日，慈禧太后又强迫光绪帝发布三道谕旨：一、以独断专行罪名，革去翁同龢一切职务，驱逐出京。任命荣禄任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二、规定文武二品以上官员，凡有升调，必须亲自到太后面前谢恩。三、当年秋，自己将奉请慈禧太后到天津检阅北洋三军。这样慈禧太后就剪除了光绪帝身边的羽翼，重新掌握了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和对京津地区军队的控制权，为日后政变埋下了伏笔。

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这两位心仪已久的政治家终于见面了。他们面对面地商议改革大计，康有为理解光绪帝当时的处境，知道改革事业不能一下子铺开，提议利用现有之权，先择重点，扼要进行。他建议为了不惊动慈禧太后和守旧官员，可以不撤旧衙门，只设新衙门，让老旧臣保持高官厚禄，拔擢有才干的新人专谋新政。他又提出废除八股取士的旧制度，为国家选拔有真才实学的栋梁之臣。他还特别提醒光绪皇帝在改革过程中，要多以自己名义发布诏书，造成自己的权威，打击保守势力，增强改革派的信心。通过这次谈话，光绪皇帝增进了对康有为的了解，把他看作股肱之臣。接见后，光绪帝本欲马上委以重任，可在旧臣们左右下，只能下诏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为了经常听取康有为的意见，特许他专折奏事，不必由总理衙门代递。

此后，康有为集中精力编写进呈了《法国变政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英国变政记》、《德国变政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等书，为光绪帝实施变法提供借鉴。他通过上书形式和光绪帝保持着联系，成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指导者。从光绪帝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的百余天中，他先后起草奏折50余件，数次提出办新式教育、定宪法、开国会、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改革的具体意见和措施。这些思想和观点不但对百日维新的进行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对以后中国人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大概都没有料到，变法从一开始就是新旧势力的一场

新较量。光绪的每一项改革措施几乎都遭到守旧派的抵制，而且守旧官僚在慈禧太后支持下，也没太把他这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由于受制于太后，缺少重臣支持，维新派官员虽热情有余却缺乏政治经验以及手中没有掌握住强有力的武装力量等原因，改革派实际上一直处于劣势。

8月间，礼部主事王照上奏，抨击顽固派，请光绪帝东游日本。请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代递，许将奏折掷还给王，拒不代呈。王上折弹劾许、怀二人，礼部侍郎堃岫仍拒绝代递。在王指责他有违圣谕，并声称要请都察院代递时，堃岫才勉强同意代送。在送上王奏折同时，许、怀也上奏诬告王图谋不轨。光绪阅过双方奏章，弄清了事情真相，于9月4日下诏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沆、溥颋、曾广汉等6名礼部主要长官之职。表彰王照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特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官候补。接着又撤掉了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

光绪帝的这些强硬措施引起了守旧派的恐慌。怀塔布等数十人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哭诉光绪帝的“无道”，恳请慈禧太后出来“训政”。慈禧太后不露声色，表面上不同意出来训政，暗地里却指使立山、怀塔布等人前往天津，与手掌重兵的荣禄加强联络，时刻准备发动政变，废黜光绪皇帝，彻底摧毁改革事业。

对于守旧派的反扑，光绪帝采取了对策。他任命具有一定维新思想的裕禄、李端棻、寿耆、王锡蕃、徐致靖、萨廉、阔普通武等6人为礼部尚书、侍郎，试图加强改革派的力量。他破格提拔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4位维新派骨干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他们4位虽仅四品官衔，却有实权。凡臣下奏章皆经4人阅览，上谕也由他们拟稿，实际上是用他们将军机大臣架空。光绪帝一直想重用康、梁师徒，因为他们政敌太多，出于策略考虑才选择了杨锐等4人为自己的助手。他们到任后积极协助皇帝，举办新政，做了不少实际工作。

康有为也认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感到反对派正在策划着阴谋。他意识到兵权的重要，建议光绪帝模仿日本成立参谋本部，直接隶属于皇上，以抓住军权。他还建议迁都以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和旧党的影响。

康有为试图说服光绪帝在中国改革服饰，剪掉辫子时，京城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守旧派看来，辫子是清朝统治的标志，剪掉辫子意味着满清统治的结束。光绪帝决定采纳康有为的意见，选集英才数十人，延聘外国专家，开懋勤殿共议制度。康有为与徐致靖、王照等商议，准备推举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麦孟华、黄遵宪、徐致靖、宋伯鲁等维新派核心人物入懋勤殿，以接近权力中心，参预国家管理。这一举措被顽固派看成夺权的重大步骤。他们在京津地区频繁往来，谋划对策。荣禄与庆亲王等人商量，由庆亲王出面请慈禧太后出来训政。他们在慈禧太后周围，摇唇鼓舌，说光绪开懋勤殿是为了夺权；与外国使馆联络，是在请求各国支持，以去掉太后。慈禧太后感到自己权力和地位确实发生了动摇，坚定了推倒光绪帝的决心。

9月13日，光绪帝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请安，准备汇报开懋勤殿之举。慈禧太后一反常态，满面怒气，光绪帝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回宫后，他越想越怕，便召杨锐入宫，希望想些办法保全自己，把变法事业进行下去。见杨锐只是说些安慰的话，拿不出什么主意来，光绪帝便写了一个密诏，让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商量出救急的办法。

见到密诏后，谭嗣同将康有为拉入卧室，出主意：速召袁世凯率兵入京，

围颐和园，将慈禧太后软禁起来。康有为经一夜思考，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次日，与林旭、梁启超等人相商，大家也都认为只有将太后软禁起来，才能阻止守旧派可能发动的政变，保证变法事业的进行。

当时京津地区驻有三支军队，由董福祥、袁世凯、聂士成分别统领，都归荣禄节制。变法之初，康有为等人就担心保守势力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害怕慈禧太后和荣禄利用天津阅兵之机发动政变，所以一直想抓住一支军队。因为袁世凯曾参加过强学会，又长期派驻朝鲜，通达世界情势，便成为康有为争取的对象。经过试探，他也曾表示过对荣禄的不满和对变法事业的赞成。9月11日，康曾上折保荐袁世凯，请光绪帝召见，委以重任，成为与荣禄抗衡的军事力量。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授以侍郎候补职。指示袁：“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意味着袁可不听荣禄调遣。康有为等人对此感到高兴。

光绪帝召袁世凯进京，引起了狡猾的荣禄的警觉。他马上调聂士成守天津，以切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入京，预防政变。同时派人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训政。

这时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时开过的军队更增加了百姓的恐慌。光绪帝知道危险就要来临，为了保护维新派的力量，以谋东山再起，他决定让康有为立即离开北京。17日他颁下明诏，催促康有为去上海办官报。第二天，林旭又带来了光绪帝写给康的密诏。告知：命他出京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让他爱惜身体，准备将来共建大业。

康有为读完密诏，深受感动。他急召谭嗣同、梁启超研究应急办法。决定由谭当晚去见已到京的袁世凯，请他采取紧急措施来救皇上。当晚夜深人静之时，谭嗣同只身来见袁世凯。谭请袁屏退左右，取出光绪帝写给他们几人的密诏让袁看。然后说：“今有救皇上的，只有您，您如果想救，请马上去救！”稍停片刻，谭一字一顿地说：“您如果不想救，可以到颐和园告密，把我杀死，求取富贵。”袁世凯当场表示：受皇上深恩厚泽，一定尽力报效。谭见袁如此，便向他说：“万一荣禄在天津阅兵时实行兵变，请您一定用武力保护皇上，肃清叛臣。”袁慷慨激昂，表示如果变起，杀荣禄就如同杀死一条狗。谭见袁态度坚决，很感放心，与袁详细商量的救援具体方案。康有为得知谭访袁经过后，心中得到一丝安慰。20日清晨，他按照皇帝旨意，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康有为离京后，北京城风云突变。光绪帝调袁之事，使慈禧太后相信：光绪皇帝这个一贯俯首贴耳的“儿子”确有发动政变的意向。她和荣禄采取了一系列的调兵遣将措施，以备不测。光绪定于20日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消息，促使她下了夺回权力，再出“训政”的最后决心。原来，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退休后到中国游览。康有为听说后，即邀请他来京，建议请他做变法的顾问。一些朝臣也上奏请聘伊藤为“客卿”，参预新政。过于敏感的守旧派把接见伊藤博文看作光绪帝发动最后进攻的信号，他们相信光绪帝将让伊藤进军机处，掌大权，对他们下手。慈禧太后于19日晚，回到紫禁城，开始控制大局。守旧派为推进政变，由杨崇伊将早已拟好的请太后训政的奏折呈上，各守旧大臣一齐恳请太后复出。慈禧太后见时机成熟，再次垂帘听政，重新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21日，她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请太后训政的诏书，正式接管了政权。维新志士苦心经营的变法事业，经历百余日惊心动魄的斗争，至此正式落下帷幕，以失败而告结束。

袁世凯 18 日夜向谭表态后，思想处于激烈的矛盾斗争中，他一方面确实想报效皇上，借机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深感守旧势力强大，恐怕自己以卵击石，碰得头破血流。经再三考虑，他想还是看看风头再说。20 日，再一次被光绪帝召见后，他感到形势已经逆转，在回天津的火车上，做出反戈一击的决定。当晚一下火车，他急忙赶到荣禄的衙门，将谭嗣同等人的计划全盘托出。这一来，不但维新派失去了挽救局面的最后机会，而且使顽固派抓住了反攻倒算的把柄。

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后，立即发布了逮捕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通缉令。并派兵包围南海会馆，将正在会馆的康广仁和康有为的学生程大璋、钱维骥等人逮捕。数千清兵在京城搜查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康有为。21 日晚，慈禧太后得知康有为还没有抓到，十分气恼。命在全国严密查拿，通告各地官员：康有为进药毒死皇帝，一旦抓获，立即就地正法。其时，康有为已在天津搭上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正在去上海的途中。他还不知道这一系列事变。荣禄在天津通过旅馆查到了康有为的去向，马上派一快艇追赶“重庆号”，幸好快艇燃料不足，只好中途返航。船到烟台时，又因密码被人带走无法译出密电内容，而让康有为偶然走脱。船将到上海时，情况大不一样。地方官员早已布好罗网，等待着康所乘的轮船。这时，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收到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求援救康有为的电报。征得英政府同意后，他派上海工部局职员濮兰德乘一艘驳船，在吴淞口外拦住“重庆号”，用通缉使用的照片找到了康有为。这时康有为才知道变法已失败的确切消息，不禁悲从中来。听说光绪帝已死，他顿感万念俱灰，欲投海自尽。在人们劝慰下，他随濮兰德乘驳船登上停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公司的“巴拉勒特号”轮船。27 日，在英国炮舰护送下，乘“巴拉勒特号”轮船转赴香港。

歹毒的统治者连他的家属也不放过。10 月 1 日，下令将康有为的所有书籍版片，由各地方官严查销毁，又命两广总督督饬地方官查抄康梁原籍财产，捉拿家属。幸亏他们早有准备，在康有为的学生掩护下，逃至安全地带。及至清政府迫害康有为家属的命令传到南海，他们已经转移，这才免遭灭门之灾。

慈禧太后剥夺了光绪皇帝的一切权力，将他囚禁于瀛台。他变法时的施政文件都被太后没收，作为向维新派清算的依据。凡与新政有关的官员，或对新政表示过赞同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或被革职，或被降级，或被通缉，或被逮捕，或被流放，或被杀害，弄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礼部尚书李端棻因保荐康有为，同情新政，被清政府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戒。湖南巡抚陈宝箴因保荐康等维新人士，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在追捕康有为的同时，逮捕了一些北京及各地的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张荫桓等人先后身陷囹圄。梁启超因赴日本领事馆请求救援康有为，而被日本领事馆保护起来。谭嗣同本有可能脱险，但他抱定必死之心，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放弃了求生的机会。9 月 28 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等六位维新志士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被清政府杀害于北京菜市口。

腐朽反动的清朝统治者，以血腥手段残酷镇压了这一次爱国运动。他们不会懂得：这个暂时的胜利，正是他们为自掘坟墓而挖下的第一锹土。资产

阶级救亡图强运动没有因他们的镇压而消歇，反倒兴起了更加汹涌的波澜，终于将清朝封建政权卷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烈士们的鲜血，浇灌了新生思想幼苗，最终长成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刺破了阴云密布的苍天。

六、流亡海外，自强不息

29日，康有为到达香港，在港英当局保护下，暂时没遇到生命危险。这时，北京的维新党人受迫害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他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但光绪帝仍活着的消息，使他燃起了救亡的一线希望。他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维新事业奔走呼号。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揭露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王朝的腐朽，宣传自己的维新主张。他把皇帝密诏作为宣传工具，以皇帝密使的身份给各国驻华公使写信，请求他们联合出面干涉慈禧政权，还政于光绪皇帝。

到港后，他致电日本驻华公使，请求保护。不久，日本首相同意康有为到日本避难，由日政府给予保护。10月19日，他乘日轮离港赴日。25日，他抵达东京，与先期到达的学生梁启超见面。虽然分别只有月余，师生历经大难，重新聚首，都有隔世之感。到日后，他马上让梁启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会谈，寻求支持。梁提出请日政府与英、美等国联合干预，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政权，让光绪皇帝复位。他们不明白：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愿意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却不愿因中国政局的变化，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所以他们对康、梁的请求没有予以明确的答复。

戊戌政变后，很多中国的反清人士来到日本。曾在湖南与梁启超、谭嗣同共同进行过资产阶级思想宣传的唐才常，接受了康有为让他回国发动哥老会起兵勤王的指示。他通过好友，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就在长江各省起义之事进行了磋商。唐才常主张康、孙两党联合行动。孙中山表示赞成，并说：如果康能放弃保皇，投身革命事业，那么，不但两党可以联合行动，而且可以奉康为领袖。

康有为的主张是拥护皇帝，实行变法，走的是改良道路。革命派则是坚决反对清廷统治，在中国建起共和国制。他们在双方都不放弃自己纲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合作的。康有为个性执拗，而且受传统忠君思想影响很深，对光绪皇帝又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所以当不当领袖倒无所谓，不保皇可万万做不到。但考虑到自己在日本的处境，他答应，可以与革命党人谈一谈。经犬养毅等人联络，约定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举行会谈。会谈时，康有为借故没有到会。梁与孙、陈谈了整整一夜，都觉得有合作的必要。过两天，陈少白特意去拜访康有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因在斗争宗旨上谁也不做让步，谈话不欢而散。以后，双方成见日深，竟成了两股对立的政治势力。

其实，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证明：在中国，依靠统治者，走从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只能用更激进的手段推翻封建统治，搬开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中国才有自新自强的希望。变法失败后，虽然康有为仍在为救国救民苦心思索，四处奔走，他的爱国赤诚仍让人感动，可他的主张已经落后于中国救亡斗争的现实，他的思想已被排除于中国进步思潮之外，有时甚至起着不应当起的反面作用。

此时，清政府就保护康有为问题向日本政府频频交涉，日本一些政客和军人也向政府施加压力。在一些友人周旋下，日外务省资助9千元活动经费，请康有为转赴他国。在日本活动了几个月，没取得什么积极成果，让康有为感到焦躁。他也正在考虑去欧美各国活动，于是在1899年3月22日，乘船离开日本。

4月初，康有为一行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上岸时，受到等候多日的华侨们的热烈欢迎。接着，华侨又在中华会馆举行上千人的欢迎大会。康有为作为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英雄，受到热切希望中国早日富强的华侨们的尊崇和礼遇。所到之处，都为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成千华侨簇拥着他，听他那热情洋溢的讲话，每个人胸中都激荡着爱国豪情。

从加拿大，他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请求英国政府出兵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遭到拒绝。至此，他以申包胥哭秦庭精神感化资本主义国家出兵救皇上、救中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康有为是决不退缩的人。他见乞求列强的路行不通，便另辟蹊径，决定发动华侨，形成一支海外的坚强改良群体。他回到加拿大，与华侨李福基、冯秀石等人商议成立一个组织，起初命名为保商会，因为华侨中十有八九是商人。后有人提议：既然只有保皇才可以保国，保国才能保侨，不如取名保皇会更好。这个提议正合康有为的心意，也得到了大家的赞成。7月20日，保皇会正式成立。以康有为为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为副总会长，下设协理、干事、书记等员若干。总部设在澳门，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等地各设总会。保皇会章程规定：“以保全中国为主”，“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康有为把保皇与变法、保国联系在一起，得到了广大华侨的认同，产生了很大号召力。当时在海外，康有为一派的名声远在革命党人之上。经过努力，这个团体得到迅速发展，两年间，共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达100多万人，分布于世界200余个城市。在发动华侨参加爱国运动方面，保皇会起了重大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推翻清朝统治已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对群众运动的方向也起了误导作用。受思想局限，康有为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保皇会成立后，第一个重大活动是在光绪皇帝30岁生日时，举行“祝圣寿”仪式。在飘扬的大清龙旗下，数百男女老幼行三叩九拜之礼，遥祝皇上万寿无疆。这个场面，今天也不好说是一场庄严的正剧，还是一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这年10月，因母亲在香港病重，他经日本返回香港。这时清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寻找机会对他行刺。一天夜里，一个刺客趁天黑窜进康所住的院子，被正在楼下谈话的唐才常等人发现后，狼狈逃窜。刺客又买下康有为邻居的房子，在下面挖地道。想在康居室下埋炸药，炸死康有为。后被发觉，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恐怖的环境使康有为和家人日夜不安。他应新加坡著名华侨领袖邱菽园的邀请，于1900年1月下旬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在那里，接受英国政府的保护。

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就开始策划用武力推翻慈禧太后统治，拥戴光绪帝复辟。他派唐才常回国，联络长江沿岸哥老会起兵。1899年末，唐来到上海，成立正气会，号召海内外仁人志士共举大事。不久，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筹备组织自立军，发动起义。康有为以忠君勤王名义，在海外筹集经费，支持自立军的活动。康有为除通过唐才常等人组织自立军在长江流域起义外，还指示弟子徐勤等在广西、湖南等地起兵以造成合兵共捣京师之势。

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康有为认为是起兵的大好时机，对广西起义做了详细安排。此时，唐才常的活动也卓有成效。7月26日，他在上海召集各界名流开会，成立中国国会，以清光绪皇帝复辟，创造新的自立国为宗旨。国会召开后，唐将自立军分为五路，定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

湖南同时举义。可是，由于康、梁所筹经费迟迟不能到位，起义时间不得不一拖再拖。自立军发动前，唐才常曾以学生名义联络湖广总督张之洞，请他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张之洞起初持观望态度，后来见列强并不支持保皇党，便采取行动，于8月22日派兵包围自立军总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余自立军骨干。当晚将唐等22人杀害。随后，广西等地起义也告失败。康有为用武力拥戴皇上的企图至此破灭。

孙中山此时也想在南方发动起义。他请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相会。宫崎知道康有为在新加坡，便建议联合康有为共同起事。他以前曾救助过康有为，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促成合作。不料这时康有为收到多次报告，说孙中山组织了一批刺客前来行刺，误以为宫崎等人是为行刺而来。宫崎到新加坡后，康给他写了一信，委婉谢绝宫崎的拜访，引得宫崎十分恼火。此时，有人告发宫崎前来行刺，新加坡警察将宫崎等人逮捕后，驱逐出境。此事造成孙、康之间关系的完全破裂。康有为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革命。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来往比较密切。受孙影响，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他对康有为创办保皇会，有自己的看法，主办的《清议报》上一般不登保皇会的文章，欧榘甲、韩文举、张智若等康有为的学生思想也渐趋激进，主张与革命党人合作。经进一步接触，两党有意推举孙中山为合并后新组织的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起初有些顾虑，以为对老师无法交待。孙劝他：弟子为会长，老师地位更尊。梁以为有理，便表示同意。梁启超和欧榘甲、韩文举、罗普等13位康门弟子联名给康有为写信请示。信中表示赞成共和制度，说康有为年事已高，可安心静养，由学生们接替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康有为见信大怒，回信怒责梁启超等人背叛师门，马上把梁、欧等人分调到别处办理保皇会事务。康有为的学生们向来畏惧老师的威严，敬之如同严父，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在日本的康门弟子纷纷起来指责他们的背师行为，称他们是“十三太保”。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只好屈服。两党的合作之议遂被搁置，康、梁之间从此产生了无法消解的芥蒂。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辛丑条约》，中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梁启超、欧榘甲等康门弟子再次深切感到非革命无以救国，连紧紧追随康氏的徐勤思想也激进起来。他们公开发表文章，宣传推翻清廷、革命。梁启超甚至在给康的信中，也大讲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康有为绝不能容忍弟子们的反叛行为，他先是给学生们写信，开导他们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见说服不了这些学生，他便摆出家长姿态，进行严厉训斥，并以脱离关系相威胁。在他的威逼劝诱下，弟子们诚惶诚恐，表示悔过，从此再不敢谈反清王朝的革命，又跟着教师弹起了保皇立宪的老调。

康有为自己绝不会想到，此时，他的思想与行为已成了阻挡时代前进的绊脚石。革命党人迫切感觉到，批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观点，廓清其思想迷雾已成为动员民众，共同革命的紧要任务。著名学者章太炎先后发表《正仇满论》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篇重要文章。驳斥保皇立宪主张和革命会造成分裂亡国的论调，论证只有推翻反动的清政府统治，中国才能走向富强。章太炎的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许多人看清了革命的前途，走向革命营垒。此后，康有为在中国政坛渐渐失去昔日的光辉，他的号召力与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小了。

这时，康有为除忠君救国的谋划外，进行了一系列思想启蒙活动。他领导保皇会在世界各地创办了大量报刊，开启民智，进行启蒙思想的宣传，对

国人及华侨的思想觉醒，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他大力向华侨们宣传教育的重要，鼓励人们创办学校，发展教育。在他的倡导下，海外华侨兴起了发展教育风气，推动了华侨人才的培养。为使国家富强起来，他还大力提倡兴办实业。1903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商务公司，计划兴办五金、矿产、轮船、铁路、银行等。这个商务公司先后在国内外办起了十余家企业，后因不善经营、人员复杂等原因，都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为延续苟延残喘的生命，打起了立宪招牌，上演了一出预备立宪的闹剧。康正在欧洲各地游历考察，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以为他大展宏图的时机又来到了。回想起多年来他主张的反对女子缠足、废八股取士、兴学校、改革官制等主张都已实现，现在君主立宪制度也即将由朝廷实施，不由十分得意。他以总会长名义宣布保皇会已完成使命，改为国民宪政会（后又改称中华帝国宪政会）。1907年3月，康有为在纽约主持召开中华宪政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立宪会以尊皇帝、君主立宪、扩大民权为宗旨，以监督政府、讲求宪政为主要任务，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他向清政府请愿，提出开国会行立宪、定国名为中华、在江南建新都、加强对地区管理、多开工厂、罢全国各税令为地方自治、让民众举议员等多项改革措施。其实，清廷的立宪只是虚晃一枪，并没有什么诚意。对他的建议，清政府不屑一顾。1908年11月4日，在慈禧太后死去前一天，光绪皇帝突然去世。这一来，康有为靠清政府靠皇帝救国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1911年，革命烈火燃遍全国。对于革命，他十分害怕，总觉得革命像洪水猛兽，会闹得天下大乱。在清廷葬身于火海前夕，他派遣梁启超回京活动，企图以他往日的威望，控制住局面，保住大清江山，由他掌握政权。可是革命形势飞快发展，中华民国很快成立，清皇室宣布退位，历史的进程又一次提醒他已落伍！

民国成立后，他没有再组织或参加什么政党，没有以政治领袖的身分在历史风口浪头上搏风击浪。但他继续做着救国、富国、强国之梦，他仍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操心、奔劳。他倡导尊孔，坚持以孔教为国教，以拯救世道人心；他反对袁世凯当皇帝，恐怕这个野心家把中国引向水深火热；他以为宣统复辟，可以收民众之心，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因而感到振奋。……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在青岛参加广东同乡为他举行的宴会。席间，觉腹部疼痛难忍，经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31日凌晨5时30分，因毒性紧急发作，他与世长辞。

在70年的人生旅程中，这位巨人背负重任，艰难跋涉，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怀着人类大同的崇高理想，带着对中国前途的满腹忧虑，他离开了人间。他不能也不必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操劳了！可是，此后中国的沧桑巨变，难道没有深深刻着他终身奋斗的印记吗？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会永远镌刻三个辉煌的大字——康有为！

